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的大学生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梁爽 杨阳 褚钰萌

南通理工学院用友数智学院 江苏南通 226000

摘要: 创业意愿是创业行为的前置条件,探究其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对激发大学生创业活力、缓解就业压力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社会认知理论与组态视角,以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为前因变量,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对156份江苏省在校大学生问卷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识别驱动高创业意愿的多元等效路径。研究结论为精准制定大学生创业激励政策、构建差异化支持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启示。

关键词: 社会认知理论; 创业意愿;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引言

就业是推动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提高社会创新的重要引擎,而创业意愿是创业行为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是迈向创业过程的第一步^[1]。自2015年国务院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来,我国陆续出台创业补贴、税收优惠、融资便利等一系列支持政策,积极鼓励大学生创业活动。然而,政策支持下的大学生创业比例仍未显著提升,2023年《中国大学生创业报告》数据显示,96.1%的受访大学生有尝试创业的想法,但仅有2.12%的学生成为“准备好了的”创业者。大学生创业环境具有特殊性,其创业意愿更容易受到外部因素干扰,因此,深入探究影响大学生创业意愿的核心因素及作用机制,对于激发创业内生动力、缓解就业压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理论基础与模型构建

(一) 社会认知理论

社会认知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Bandura提出,核心

观点是个体、环境与行为三者构成动态交互的三元关系^[2]。该理论强调个体认知因素、外部环境因素与创业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个体通过对环境的感知与解读形成认知,进而影响行为倾向。该理论为解析“创业认知-外部环境-创业意愿”的内在关联提供了核心框架,尤其契合大学生创业环境特殊性与认知可塑性强的群体特征。

(二) 组态理论

组态理论强调多个前因条件的组合效应,认为复杂结果并非由单一因素决定,而是源于不同变量的协同联动。该理论主张通过定性比较分析(QCA)等方法,识别导致同一结果的多种等效路径,契合创业意愿影响因素多元且交互的本质^[3]。结合现有研究成果,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形成存在“个体特质驱动”“环境助推”“协同联动”等不同组态模式,为本文从组合视角构建模型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 模型构建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和组态视角,构建三元交互模型:以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为前因变量,创业意愿为结果变量,探讨个体认知与外部环境的作用对创业意愿的影响路径。本文借鉴钱永红^[4]关于大学生创业意愿的研究将个体因素分为主动性、自我效能感和风险偏好。环境因素主要是指影响个体的外部环境因素。基于郭玉娟^[5]等的研究,本文将环境因素分为政策支持、家庭支持和学校支持。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方法

为进一步探究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本文以

基金项目: 2025年创新创业教育研究课题《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的大学生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研究》(编号:CXCYKT039)。

作者简介:

- 1.梁爽,江苏南通人,南通理工学院,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数字经济;
- 2.杨阳,女,江苏南通人,南通理工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电子商务、消费者行为;
- 3.褚钰萌,女,江苏南通人,南通理工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电子商务。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为核心研究方法,借助fsQCA 3.0软件探究个体因素与环境因素的组合作用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路径。该方法突破传统线性分析局限,能有效识别多因素协同驱动高创业意愿的等效路径,契合创业意愿影响机制的复杂性特征,为揭示个体与环境的交互效应提供有力支撑。

(二) 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江苏省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发放问卷。共发放问卷156份,回收问卷156份,有效回收率为100%。

(三) 问卷设计

为保证问卷的可靠性及实用性,本文参考已有学者的研究问卷进行设计。问卷包含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基本信息,涵盖性别、年龄、学历等人口统计学变量。第二部分为核心题项,对应个体因素、环境因素及创业意愿。本文参照郭玉娟^[5]、李爱国^[6]等的研究设计了个体因素的题项;参照郭玉娟^[5]及徐兴强^[7]等研究设计了环境因素相关题项;创业意愿则参照了郭润萍^[8]等设计的量表。

三、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 信度效度分析

本文借助SPSS 24.0对问卷数据进行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各维度量表信效度均达标。信度检验中,各维度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均大于0.8,其中创业意愿维度 α 系数达0.934,符合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组合信度(CR)值介于0.750~0.900之间,表明各维度题项内部一致性强。效度方面,KMO值均大于0.7,Bartlett球形度检验显著(Sig=0.000)。各维度的平均方差提取值(AVE)均大于0.5,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

(二) fsQCA分析

1. 变量校准

本文参考Fiss^[9]的研究,采取直接校准法将原始数据转化为0-1区间的隶属度值,选择前5%为完全隶属,

50%为交叉点,后5%为完全不隶属作为锚点对涉及的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进行校准,确保校准结果贴合创业意愿研究的实际情境。利用fsQCA软件的calibrate函数进行数据校准。本文前因条件和结果变量各自选取的锚点如下表:

表1 各变量校准锚点

变量集合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主动性 (In)	4.5	2.75	1.25
自我效能感 (Self)	4.67	3	1.33
风险偏好 (Risk)	4.75	3.25	1.25
政策支持 (Policy)	4.67	2.67	1.33
家庭支持 (Family)	5	3	1
学校支持 (School)	4.5	3.5	1.25
创业意愿 (Wish)	4.75	2.75	1.25

2. 单因素必要分析

参考Schneider^[10]等学者提出的标准,本研究将必要条件的一致性临界值设定为0.9。借助fsQCA软件进行必要性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前因条件的一致性分数均未达到0.9的临界标准。这表明这些因素对高创业意愿有正向关联,但单独无法构成必要前提,验证了创业意愿形成的复杂性,即无任何单一因素可独立决定高创业意愿的产生。因此,后续需通过组态分析深入挖掘前因条件的组合效应,识别激发大学生高创业意愿的多元等效路径。

3. 组态分析

本文遵循“案例频数阈值 ≥ 2 、一致性阈值 ≥ 0.8 、PRI阈值 ≥ 0.7 ”的标准,通过fsQCA 3.0软件生成复杂解、中间解和简单解。本研究采用中间解进行分析,总体解的一致性为0.91,总体解的覆盖度为0.56,表明这些组态能够较好地解释高创业意愿的产生。从组态构成特征来看,自我效能(Selffs)与风险感知(Riskfs)是贯穿所有组态的核心条件,这一结果印证了社会认知理论的核心观点——个体的自我认知与风险决策倾向是创业意愿形成的内在基础,凸显了个体层面因素的决定性作用。

表2 组态分析结果

编号	主动性	自我效能	风险感知	政策支持	家庭支持	学校支持	原始覆盖率	唯一覆盖率	一致性
1	●	●	●		●	⊗	0.2157	0.0493	0.9538
2	●	●	●	●		●	0.4538	0.0253	0.9330
3	●	●		●	●	●	0.4619	0.0334	0.9113
4	⊗	●	●	⊗	●	●	0.1419	0.0204	0.9451

注: ●表示核心条件存在 ⊗表示核心条件缺失 空白表示条件不相关

四、研究结论

结合外部支持条件的组合差异,4类组态可划分为三大驱动模式:

(1) 家庭支持替代型模式(组态1):该组态的一致性高达0.9538,其核心特征是“主动性+自我效能+风险感知+家庭支持”的核心条件组合,同时伴随学校支持的缺失。这表明,当大学生具备充足的创业信息储备与较强的自我效能感、风险承受能力时,家庭支持可有效替代学校支持的功能,为大学生创业提供直接保障。

(2) 全维外部支持协同型模式(组态2、组态3):组态2与组态3的原始覆盖率分别为0.4538和0.4619,是驱动大学生创业意愿的主导组态,合计覆盖超90%的高创业意愿样本。两类组态的共性是“信息获取+自我效能”的双核心条件,叠加政策、学校或家庭的外部支持体系。其中,组态2侧重“政策+学校”的制度性支持,政策红利与学校创业教育、实践平台形成互补,为大学生创业提供制度保障与能力支撑;组态3则进一步纳入家庭支持,最大程度降低创业不确定性,激发创业意愿。

(3) 外部支持补偿型模式(组态4):该组态的核心特征是信息获取与政策支持的双重缺失,同时伴随“自我效能+风险感知+家庭支持+学校支持”的条件组合,一致性达0.9451,体现了家庭-学校协同支持的补偿效应。在缺乏创业信息渠道与政策扶持的情境下,家庭的情感支持与资源供给,叠加学校的创业培训与指导,可有效弥补外部环境的不足。

参考文献

[1]Maheshwari G, Khanh K L.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al support 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in Vietnam: The mediating role of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i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Education, 2022, 20(2): 100553.

[2]Bandura A. Human agency in social cognitive theory[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9,44(9):1175-1184.

[3]Ragin C. 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fuzzy sets and beyond[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4]钱永红.创业意向影响因素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04):144-152.

[5]郭玉娟,李玉婷,安雯雯,等.基于三元交互理论的大学生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研究[J].管理现代化,2024,44(05):147-158.

[6]李爱国,曾宪军.成长经历和社会支撑如何影响大学生的创业动机?——基于创业自我效能感的整合作用[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8,40(04):30-42.

[7]徐兴强,潘伟业,彭伟.个体-环境交互视角下大学生返乡创业意愿的激发机制——基于混合方法的研究[J].江苏高教,2024(07):96-106.

[8]郭润萍,李树满,韩梦圆.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意愿形成机理研究[J].外国经济与管理,2021,43(03):135-152.

[9]Fiss P C. Building better causal theories: A fuzzy set approach to typologies in organization researc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1, 54(2):393-420.

[10]Schneider C Q, Wagemann C. Set-theoretic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A guide to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